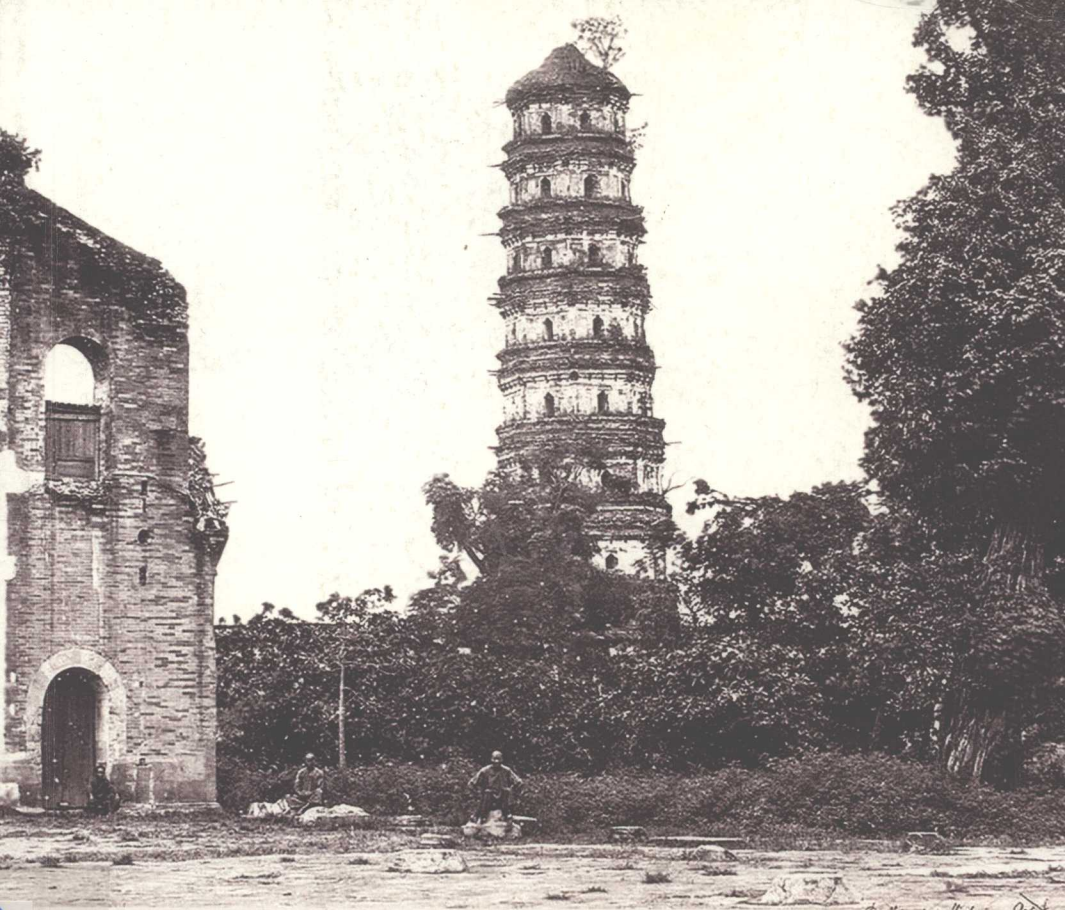




搅动晚清帝国 秩序的力量

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
中国报道研究

谢庆立 著

學苑出版社

搅动晚清帝国 秩序的力量

谢庆立 著

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

中国报道研究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搅动晚清帝国秩序的力量：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研究 / 谢庆立著. --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077-5437-7

I. ①搅… II. ①谢… III. ①外语—报纸—文化史—
广州—清后期 IV. ①G239.29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45430号

出 版 人：孟 白

责任编辑：潘占伟

印制总监：张 翔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010-67601101 (销售部)

印 刷 厂：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880 × 1230 1/32

印 张：11.25

字 数：225千字

版 次：2018年3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早期在华外报报道中国的背景	
第一节 西方的“中国想象”	017
第二节 “天朝”对抗“新世界”	029
第三节 19世纪早期西方侨民与在华外报	044
第二章 广州外报与对外中国报道的发端	
第一节 《广州纪录报》：中国报道的“先锋”	058
第二节 晚清中国的“道德图景”	067
第三节 动乱的帝国	074
第三章 广州外报的舆论热点	
第一节 英文外报群的形成	091
第二节 “中国国民性”观察	105
第三节 谁是“野蛮人”	134

第四节	《中国丛报》与“律劳卑事件”	151
第四章	鸦片战争前广州外报中国报道	
第一节	庞大而虚弱的“天朝”	179
第二节	衰败的帝国	197
第三节	中西关系视野中的中国报道	220
第四节	鸦片贸易危机	238
第五章	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外报中国报道	
第一节	战争舆论的序曲	265
第二节	战争期间的中国报道	277
第三节	战争期间的中国国民性观察	306
第六章	广州外报与林则徐媒体形象的塑造	
第一节	闻其声不见其人	323
第二节	见事不见人	327
第三节	见人见事的现场报道	334
第四节	林则徐媒体形象的完成	340
参考文献		347
后 记		355

绪 论

一、研究主旨和几点说明

1827年11月8日，由英国人创办的《广州纪录报》（*The Canton Register*）在广州口岸的马格尼亚克洋行出版。^[1]这是外国人在华出版的首家英文外报，揭开了在华英文媒体对外报道中国的序幕。到19世纪末，西方在华外文报刊发展到130多家，中国对外新闻传播的话语权被西方在华外报所垄断。直到20世纪初，中国对外传播话语权才逐渐回到中国人手中。《广州纪录报》创刊至今已190周年。回溯这段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对外新闻传播话语权的变迁与国家的发展状态密切相关；对外新闻传播话语权不仅关乎国家的尊严和形象，而且关乎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发展空间。

基于此，本书把在华外报的中国报道作为研究专题，截取

[1] [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109页。

19世纪早期这一时段，锁定广州这一地理范围，考察在华外报发端时期的广州外报有关中国的报道议题、报道内容和舆论焦点的变化，梳理广州外报中国报道的变化脉络，分析广州外报对外报道中国的动机，探究广州外报与中西关系和中西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本书把19世纪20年代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一个研究时段，称之为“19世纪早期”。这一时期是在华外报的发端期。为便于论述，还有必要对“在华外报”和“在华外报中国报道”这两个“用语”进行说明。“在华外报”一词，目前已为学术界普遍使用，是指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报刊。从语种上分，有外文报刊，有中文报刊。从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英文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占据在华外报的主导地位。在华外报的读者一般是外国人。以19世纪英、美在华创办的外报为例，其读者主要是英、美等国家的在华侨民。“在华外报中国报道”是突出的历史存在。但作为“用语”，鲜有研究者使用。本书基于研究对象的特点而使用这一“用语”，目的是转变研究视角，确定研究重点，把“在华外报中国报道”作为一个研究专题。就研究视角而言，以往“对内”的研究视角，其研究往往局限于在华外报与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而对在华外报有关中国报道的内容研究重视不足；“对外”视角的研究意味着研究重点的转移，研究者把研究对象置于国际新闻传播的视域中进行考察，因此，“在华外报对外中国报道”的研究重点是报道内容，涉及议题、报道方式与传播策略等问题，需要研究者深入考察外报的具体报道文本。本书研究的是在华

外报的发端阶段——19世纪早期的广州外报及其中国报道。

二、广州外报与广州口岸的传播生态

在华外报最早是在澳门出现的，而最早的英文外报和中文外报出现于广州。19世纪早期，在华外报集中出现在澳门与广州，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存在着外报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

就澳门外报的产生来说，由于葡萄牙人在此长期居住，并设立行政管理机构，葡萄牙人已成为澳门这片土地的实际占有者。1822年9月12日，由葡萄牙立宪党人巴波沙（Paulino da Silva Barbosa）创办的《蜜蜂华报》（*Abelha da China*）在澳门出版，这是外国人在华出版的第一份外报，揭开了外国人在华办报的序幕。至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葡萄牙人在澳门先后创办了《澳门周报》《澳门杂论》《恒定报》《澳门土生公正报》《澳门政府公报》《澳门土生邮报》《真正爱国者》《商报》《澳门周刊》《葡萄牙人在中国》《澳门土生灯塔报》等11种葡文外报。^[1]这期间，虽然也有英文报刊在澳门出版，如《广州纪录报》、《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等，但多是创办于广州并在广州长期出版。1839年，中国掀起禁烟运动，加之后来战争爆发，这些英文报刊临时迁到澳门出版。与英文外报不同，澳门

[1] 据李长森的《近代澳门外报史稿》一书提供的数据统计（广东出版集团2012年版）。

出版的葡文外报极少关涉中国问题，报道内容多是葡萄牙国内和澳门葡萄牙人的相关信息。以《蜜蜂华报》为例，前后出版67余期，时间长达1年零3个月，但有关中国的报道只有5条，^[1]且篇幅很短，缺乏连贯性的议题，“总的来说，葡文报刊数量虽多，但影响不大，和当时中国形势的发展更少联系。担任在华外报主角的是英文报刊”^[2]。

就广州外报的产生而言，英文外报集中出现于广州口岸靠近珠江的外国商馆区，形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独特的文化地理景观。自1827年《广州纪录报》的创刊至鸦片战争前夕，在广州口岸先后出版的英文外报有《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又译为《中国差报和广州邮报》）、《中国丛报》、《广州周报》（又译为《广州新闻》）。

英文外报的出现得益于广州口岸的社会条件和传播生态。当时，清政府只开放广州口岸一地与外国进行贸易。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西方国家来华的散商迅速增加。到19世纪30年代中期，居住在广州口岸外国商馆的人口有300多人，其中英、美人占多半。当时，外国在广州口岸的外国商馆有50多家，仅英国就占一多半。这时，外国每年来往广州的商船有250余艘，广州口岸成为一个国际化的贸易港。伴随着商贸来往，中西之间的其他交流不断增多，广州口岸的“广州英语”成为中外人际传播的语言媒介，也是当时

[1] 程曼丽：《〈蜜蜂华报〉研究》，澳门基金会出版1998年版，第114-148页。

[2]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卷，第272页。

流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是“伶俐的中国人巧妙地运用听惯了的外国的音调，成功地弥补了自己语言的不足，并依照他自己单音节的表达方式，同时用最简单的中国话来表达他们的意思”。^[1]“广州英语”的运用，不仅能使中西资讯相互流通，也使广州口岸成为国际化信息交汇港。外报所获得的资讯，少不了来源于以“广州英语”为媒介的人际传播。当时，清政府及其地方行政机构没有对外发布信息的渠道，朝廷的发行的“京报”一般限于官僚内部阅读。政府部门即使对外商发布信息，也要通过中国人担任的行商^[2]进行转达。而游走于中外之间的行商常常以人际传播的方式，把“京报”上的信息和官方发布的公告提供给外国人，这些信息逐渐成为外报中国报道的资讯来源。广州口岸不仅是一个国际化的贸易港和信息港，也是中国政治、文化与国际社会冲突与交汇的前沿地带，其错综复杂的矛盾为外报的中国报道提供了大量信息。

广州外报的对外中国的报道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广州周报》编辑曾坦言，“我们特别注意发表有关中国的当地新闻，以便读者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态度”^[3]。除了报道有关中

[1] [美] 亨特：《广州“番鬼”录》，冯树铁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版，第67页。

[2] 行商是鸦片战争前广州口岸公行负责中外贸易的人员。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只开放广州口岸与外国进行贸易，并设立公行制度，外国人称为“广州贸易体制”。为保持“天朝体面”，清政府规定政府官员不能与外商直接交往，公行的行商在贸易上是中外商人之间的中介，在外交上是中国政府和外商之间的中介，同时负责监管外国人在华期间的活动。他们一身二任，亦官亦商。

[3] 见1835年第1卷《广州周报》，转引自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卷，第275页。

国的资讯外，这些外报还制造议题，发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甚至酝酿舆论风暴。《中国信使报》在创刊号上就声称，“我们深信，我们非常需要传播媒介，以传达别人无意谈论的观点”^[1]。这些外报虽然也刊登商业信息，但主要报道有关中国的时事资讯，且信息量大，并围绕这些资讯发表对中国问题的评论，其议题设置、报道方式和传播策略具有较强的连续性。到19世纪30年代，广州口岸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外报群，并成为对外报道中国的主导力量。^[2]

三、相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存在问题

学术界较早注意早期在华外报问题的学者是戈公振（1890—1935），他曾任上海《时报》总编辑，出版《新闻学撮要》《中国报学史》《新闻学》等著作。他在《中国报学史》一书中提到“广州英文报纸”这一历史现象，并列举《广州纪录报》、《广东报》（又译为《广州周报》）、《华人差报和广东钞报》（又译为《中国信使报》）、《中国文库》（又译为《中国丛报》）^[3]和《广东杂志》（*The Canton Miscellany*）。^[4]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主编的《中

[1] *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 July 28th, 1831.

[2] 19世纪早期广州口岸还出现两种中文外报：1833年8月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8年10月出版的《广州消息》（创办者为英国人奚礼尔，目前在大英图书馆仅存两期）。这两种报刊主要宣传西方近代政治文化和科技文明，其阅读对象是中国读者。本书不把这两种报刊列入研究范围。

[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4-95页。

[4] 戈公振先生列举有误，该报于1831年6月在澳门出版，由东印度公司创办。

国新闻事业通史》出版，他在第一卷专门开设“外国人早期在华办报活动”一章，对19世纪早期出现于澳门和广州的外报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注意到，“这些英文报刊比同时期中文报刊要先进得多。创办中文报刊的那些外国人初学中文，难以驾驭，而他们又不得不让这种近代传播媒介尽可能适应中国读者的承受能力和阅读习惯，致使这些中文报刊办得非骡非马，不中不西，保留了很多旧式报刊的痕迹。至于办英文报刊就不同了，他们有本国现成的办报经验可以借鉴，办报方式不受限制，文字可自由运用”^[1]。当时的英文外报之所以比较成熟，其传播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报道内容、报道方式和编辑形态无不顾及西方读者的阅读期待。澳门理工大学教授李长森对19世纪澳门出现的外报进行了系统研究，他在2012年出版的《近代澳门外报史稿》一书里，专门开设“澳门外报的产生和发展”一章，列举出“外报初创时期”的5种英文报刊，除了《广州杂文报》（*The Canton Miscellany*）创办于澳门外，其余4种都是在广州创办的。作者侧重于报刊创办的背景、创办人、报刊性质等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外报对外中国报道的内容研究。

以上几种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其共同特点是：都侧重于19世纪在华外报的发生、发展和社会影响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学教授程曼丽的《〈蜜蜂华报〉研究》（澳门基金会1998年出版）一书，从传播学的视角，考察该报出版的背

[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卷，第281页。

景，梳理和分析了这份外报的编辑形态和报道内容，为以后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些新思路。

学术界较早涉及“在华外报对外中国报道”研究的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甘险峰和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童之侠。甘险峰博士的专著《中国对外新闻传播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一书，较为系统地梳理了百余年来中国对外新闻传播事业的历史演变，并对外国在华大众传媒的运作机制和社会影响进行了研究，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遗憾的是，甘险峰博士此项研究的时间上限为19世纪末，没有涉及早期在华外报的对外中国报道。之后，童之侠教授的《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多角度地考察中国国际新闻传播史，对有关理论进行多层次的论证，专门列出“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的办报活动”专题。以上两位研究者注意到在华外报对外中国报道在国际新闻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近年来，有关19世纪早期在华外报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成果。暨南大学蒋建国教授的《报界旧闻：旧广州的报纸与新闻》（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是一部内容较为丰富的著作，作者收集了40多种近代广州报刊资料及其历史掌故，其中不少资料与外报有关。作者采用报刊影印图片和文字描述等方式，使读者通过这些“历史的碎片”，感受广州近代新闻事业发展的脉络。暨南大学教授邓绍根的《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史（1827—1872）》（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系统描述和分析了美国在华早期新闻传播活动的背景、发展和社会影响。由于研究者的侧重点不同，两位学者都未能更多地关注

在华外报对外中国报道问题。

近几年来,学术界对早期在华外报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微观研究方面,研究者较注意对个别外报、报人及其作者的研究。如伍中梅的《中国第一份英文报纸〈广州记录报研究〉》、邓绍根的《美国人在华创办的第一份报纸——〈中国差报〉与〈广州钞报〉研究初探》《威廉·伍德:中国英文报刊的奠基人与开拓者》《美国在华宗教新闻事业的开端: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与〈中国丛报〉》、王化文的《中国丛报的主要作者群研究》等文章,研究者在发掘资料的基础上,认真梳理考证并提出了新观点,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第二,宏观研究方面,研究者注重探究19世纪早期在华外报产生的复杂因素,以及在华外报对中国社会产生发展的影响。如蒋建国的《19世纪广州传播生态与近代报刊的产生》、赵建国的《西关文化与近代广州报刊》《报刊地理:广州租界与近代报刊》、刘小燕的《试论外国人在华新闻媒介的生存环境》、高小淞的《基督教来华办报动机辨析》、田雷的《19世纪外报来华现象辨析》、程丽红的《论传媒文化在清代文化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文章,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有独特之处,但由于新史料发掘和运用不足,文章多以描述和介绍为主,理论上缺乏新突破。第三,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早期在华外报的报道内容。如吴义雄的《福摩萨清洁与台湾形象建构——〈中国丛报〉台湾形象论述解析》《〈中国丛报〉关于中国社会的信仰与风俗研究》、徐燕的《〈中国丛报〉与广州形象的构建》《〈中国丛报〉的孔子观及其向美国的传

播》、王海的《“京报”英译活动中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与技巧——以〈中国丛报〉为例》、张振明的《跨文化解读中的知识与权力——〈中国丛报〉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法律形象》、谢庆立的《为“天朝”建构“新世界”》《“西洋镜”里的末世图景》《在华外报与“中国国民性”话语生产探源》等文章，都注意从原始报刊文献中发掘资料，并提出研究的新思路新观点。

目前，学术界相关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研究对象过于集中，缺乏平衡性。笔者查阅10年来的研究成果，发现有关《中国丛报》的研究论文有800多篇，而有关《广州纪录报》《中国信使报》《广州周报》的研究文章只有寥寥数篇。第二，以19世纪早期在华外报文献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较少。19世纪在华外文报刊是外国读者，其报道对象是中国，而研究者较少涉及在华外报的对外中国报道研究，目前仍没出现相关的专题研究论著。第三，宏观研究过泛，微观研究和个案研究相对不足。宏观研究大多从在华外报的产生社会背景、社会影响等方面展开论证和分析，虽不乏新意，由于缺少对原始资料的发掘，其研究总体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微观研究往往以一家报刊，或者以一家报刊的某一个问题为研究对象，在“点”上寻求对外报研究的突破。这方面的研究多基于新资料的发现。与宏观研究相比，这些有价值的微观研究成果并不多见。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研究资料的限制。在19世纪早期广州出现的英文外报中，除了《中国丛报》已影印出版外，《广州纪录报》《中国信使报》《广州周报》

在国内很难见到原始文献。虽然国外个别大学图书馆存有缩微胶卷,但缩微胶卷也没能容纳这些报刊的全部内容。目前,查阅这些资料十分困难,即使找到部分有关资料,由于年代久远,不少资料印刷模糊且有残损,辨识文字、考证信息不仅十分繁琐,且会耗去大量精力和时间。^[1]除此之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未能从对外传播的视角展开研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果研究者考虑到外报的特点,转换研究视角,自然关注外报有关中国报道内容的研究。

四、本书的创新点和研究的意义

鉴于此,本书的创新点在于两个方面:(1)首次把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中国报道作为研究的对象,在考察外报文本形态的基础上,通过描述和分析,呈现19世纪早期在华外报对外中国报道的大致脉络,探寻这些外报对中西关系和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2)从对外新闻传播的视角,在大量文献资料和报道文本基础上,对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的报道内容、报道方式和编辑形态进行分析。

研究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对外中国报道有重要意义:(1)通过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从源头上探寻、梳理早期外报对外中

[1] 为寻找早期在华外报资料,笔者颇费周折。几年来,我的学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大帮助。她们利用在国外留学的机会,找到部分原始资料和外报的缩微胶卷,用拍照的方式为我收集了许多珍贵资料。但由于年代久远,其中一些材料有残损、印刷模糊,加之缩微效果不甚理想,许多信息难以辨认,给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国报道的历程，确立这一时期外报在中国对外新闻传闻史上的历史地位。（2）弥补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足，通过深入考察外报对外中国报道的具体文本，把在华外报研究引向深入。（3）打开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世界”，拓展中国新闻史的研究领域。（4）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外报与中西社会的互动关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代中国对外“传播中国”提供历史文化资源。

五、研究方法和本书框架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如下几种：

（1）跨学科研究方式。19世纪早期广州外报是复杂的社会背景和传播生态中孕育的特殊产物，自出现之日起，它就像敏感的神经一样连通着社会的各个方面，仅用新闻传播学本身的研究方式，不可能完全深入研究对象内部，有必要把新闻传播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以拓展研究领域，把握研究对象的本质。

（2）文献分析法。考察外报的编辑形态，发掘相关报刊资料，分析、解读19世纪早期在华外报对外中国报道的具体文本。同时，收集其他相关历史资料，力求探寻在华外报对外中国报道的内在运作逻辑。

（3）案例分析法。19世纪早期的在华外报时间跨度15年，涉及多种报刊，其中仅《中国丛报》前后就有20卷，总共240期，大约16000页左右；《广州纪录报》为周刊，从办刊开始至